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

——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洪羽青

【提要】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关键词】 塞尔维亚民族史学 浪漫派 批判派 民族主义 历史书写

在塞尔维亚人的历史中,拜占庭帝国曾作为宗主国对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的政治、宗教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①而奥斯曼帝国更直接统治巴尔干地区近五个世纪,对近代塞尔维亚的地缘政治起到了直接的塑造作用。塞尔维亚民族独立之际,知识精英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两个帝国的遗产中找到本民族的定位。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与塞尔维亚民族独立的历史息息相关。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了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力。与此同时,来自西欧、中欧地区的新思潮、新观念传入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思潮在巴尔干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巴尔干各民族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斗争接连出现,逐渐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1878年,塞尔维亚民族彻底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随后建立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经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联合建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②1941年该王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肢解。在获得民族独立之际到二战爆发前夕,塞尔维亚史学中较为传统的浪漫派与受到西欧、中欧学术思想影响的批判派产生了碰撞,但又在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发生了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梳理塞尔维亚浪漫派与批判派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研究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界深入地了解现代塞尔维亚史学的特点,深化对塞尔维亚历史书写的认识,

① Georgije Ostrogorski, “Vizantija i južni sloveni”, *Jugoslovenski istorijski časopis*, Vol. 1, 1963, pp. 1 - 7; Божидар Ферјанчић, *Византија и јужни словени*, Завод за издавање уџбеника, 1966, с. 5 - 7.

② 19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即第一南斯拉夫。

也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剖析塞尔维亚史学界的观点,更全面地理解塞尔维亚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历史。

有关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国内外学界已有一些讨论的声音。但大多将塞尔维亚史学放在东欧、巴尔干史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①或是仅对个别塞尔维亚史学家进行单独的研究和探讨^②或是仅在分析其他塞尔维亚史学问题时简单提及^③对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而对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到南斯拉夫王国解体之间的这一时期,浪漫派与批判派对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的研究则几乎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塞尔维亚著名中世纪史学家西玛·契尔科维奇(Сима Ћирковић)曾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为塞尔维亚史学浪漫派与批判派的关系、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在两个学派之间的构建过程问题定下了基调。他认为,塞尔维亚浪漫派与批判派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美化、工具化历史,以民族主义思想指导历史书写,而后者没有;他还认为,浪漫派的出现是塞尔维亚史学史上一个“大断裂”,打破了18世纪末现代塞尔维亚史学诞生以来科学史学观念自然发展的逻辑,而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在经历两个学派之间的大论战后彻底摒弃了浪漫派的史学方法和意识,开始了真正的发展和构建。^④

但以笔者之见,塞尔维亚史学的浪漫派和批判派之间不仅有碰撞,也有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正是在这种碰撞与融合之间构建起来的。鉴于此,本文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梳理、分析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到南斯拉夫王国解体之间的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过程,抛砖引玉,以期求教大方。

一、浪漫派与批判派在碰撞中确立现代研究方法

19世纪中后期,尚处萌芽阶段的塞尔维亚史学出现了两个学派。一个是塞尔维亚史学的“传统学派”,也被称作“浪漫主义学派”,^⑤以米洛什·S. 米洛耶维奇(Милош С. Милојевић)和潘特利

-
- ① 例如 Ivo Banac, “Historiography of the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7, No. 4, 1992, pp. 1084 – 1104; Panayote Elias Dimitras, “Writing and Rewriting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Balkan Nationalisms”, *South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 No. 1, 2001, pp. 41 – 59; Marius Turda,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Balkans”, in Stuart Macintyre, Juan Manguashca, and Attila Pók,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4: 1800 –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49 – 366。
- ② 例如 Dimitrije Djordjević, “Stojan Novaković: Historian, Politician, Diplomat”, in Dennis Deletant and Harry Hanak, eds., *Historians as Nation-Builders: Central and South-East Europ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pp. 51 – 69; Charles Jelavich, “Milenko M. Vukićević: From Serbianism to Yugoslavism”, in Dennis Deletant and Harry Hanak, eds., *Historians as Nation-Builders: Central and South-East Europe*, pp. 106 – 123; Michael Antolović, “Modern Serbia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Nation-Building and Critical Scholarship: The Case of Illarion Ruvarac (1832 – 1905)”, *The Hungari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 No. 2, 2016, pp. 332 – 356。
- ③ 例如 Љубо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ћ, “Развој Византологије”, *Зборник радова Универзитета у Београду 1838 – 1988*, Београд, 1988, с. 656 – 671; Alkesandar Ignjatović, “Byzantium’s Apt Inheritors: Serbian Historiography, Nation-Building and Imperial Imagination, 1882 – 1941”,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4, No. 1, 2016, pp. 57 – 92; Srđan Privratnić, “A Case Study in the Emergence of Byzantine Studies: Serb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Paul Stephenson, ed., *The Byzantine World*, Routledge, 2010, pp. 481 – 490。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较少,仅有一些文章略有提及。例如黄艳红《记忆构建与民族主义:近代塞尔维亚历史中的科索沃传奇》,《世界历史》2019年第5期。
- ④ Sima Ćirković, “Prelomno razdoblje srpske istoriografije”, *Vojnoistorijski glasnik*, No. 1 – 2, 1994, pp. 277 – 287; Сима Ћирковић, “Јављање ‘Критичке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је’ на великој школи и универзитету”, *Зборник радова Универзитета у Београду 1838 – 1988*, с. 645 – 654。
- ⑤ D. R. Woolf, *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 Routledge, 2014, p. 825。

亚-潘塔·斯雷奇科维奇(Пантелија-Панта Срећковић)为代表。该学派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尤其是口传诗歌)作为历史书写的主要史料,在强调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传统的同时,试图赋予新的塞尔维亚国家历史合法性,以此激发塞尔维亚民族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培养民众对本民族的历史英雄和先祖的所有光荣事迹的情感,传播有价值的知识”。^①另一个则是反对将民间口传诗歌作为史料,主张对史料进行考据与批判、鉴别与甄选的“批判主义学派”,以伊拉里昂·鲁瓦拉茨(Иларион Руварац)、斯托扬·诺瓦科维奇(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和柳博米尔·科瓦切维奇(Љубомир Ковачевић)等人为代表。1873年,鲁瓦拉茨发起了塞尔维亚历史学中最重要的一场论战——批判派与浪漫派关于史学方法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大论战。^②鲁瓦拉茨等人以米洛耶维奇·斯雷奇科维奇为代表的浪漫派进行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论战,经历两次大辩论,批判派的最终胜利孕育出现代塞尔维亚历史学的雏形。

18世纪末19世纪初,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潮的活跃和国家的独立进程推动了塞尔维亚历史学的发展。^③约万·拉伊奇(Јован Рајић)作为塞尔维亚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在《各种斯拉夫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历史》(Историја разних славенских народаоунаиначе Болгар, Хорватов, и Сербов)一书中,根据有限的资料概述了南部斯拉夫人从中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历史。拉伊奇在写作之时尚未有史料意识,没有明确区分史料和文学材料。但这一作品带有明显的教化目的,旨在通过此书使识字的塞尔维亚人了解本民族的过去,通过强调当下与塞尔维亚中世纪国家传统的历史连续性来帮助保护和加强同胞的民族意识。该书成为当时有关塞尔维亚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对下一代受过教育的塞尔维亚人影响深远。^④契尔科维奇认为拉伊奇这一作品的问世标志着现代塞尔维亚史学的诞生。^⑤

直至19世纪中期,塞尔维亚依然没有出现受过史学训练、拥有专业学术背景的历史学者,历史学尚未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专业的历史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尚未创立,也没有产生对已有的塞尔维亚历史资料的批判性文章,更没有超越拉伊奇的重要历史著作出版。^⑥这一时期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⑦继续沿用拉伊奇作品中的研究结果,从实用主义角度对待历史学,认为历史是“民族教育学”的有利工具,按照自己的民族浪漫主义观点解释塞尔维亚的历史,试图用关于“光荣过去”的叙

① Данило Медаковић, *Повјесница србског народа од најстаријих времена до 1850. године 1*, Нови Сад, 1851, с. v, xxxvii.

② 有关大论战的起始年份,学界还没有最终定论。也有学者认为此次大论战从1879年开始,参见Sima Ćirković, “Prelomno razdoblje srpske historiografije”, p. 281。但笔者认为,此次大论战以鲁瓦拉茨首次对浪漫派学者的观点提出批判为开端,即1873年。

③ 参见Stefan Berger, Marko Donovan, and Kevin Passmore,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Routledge, 1999; Stefan Berger and Christoph Conrad, *The Past as Histor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80–139。

④ 参见Никола Радојчић, *Српски историчар Јован Рајић*, Научна књига, 1952; Група аутора, *Зборник радова научног скупа Јован Рајић: историчар, песник и црквени великодостојник*, САНУ, 2002。

⑤ Sima Ćirković, “Prelomno razdoblje srpske historiografije”, p. 277.

⑥ 塞尔维亚重要文学杂志《塞尔维亚文化协会年鉴》(Летопис Матице српске)的主编雅科夫·伊格尼亚托维奇(Јаков Игњатовић)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总结了当时塞尔维亚历史学的趋势,指出自拉伊奇时代以来,塞尔维亚历史学没有任何进步。拉伊奇的不朽作品没有被超越,“我们要么纯粹模仿拉伊奇进行历史书写,要么纯粹收集材料而没有写作”。参见Јаков Игњатовић, *Поглед на књижевство, Летопис Матице српске*, Књ. 96, 1857, с. 159。

⑦ 例如达尼洛·梅达科维奇(Данило Медаковић)、约万·斯特里亚·波波维奇(Јован Стерија Поповић)和约万·苏博蒂奇(Јован Суботић)等。参见Michael Antolović, “Modern Serbia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Nation-Building and Critical Scholarship: The Case of Illarion Ruvarac (1832–1905)”, p. 335。

述强化同胞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武克·斯特法诺维奇·卡拉季奇(Вук Стефановић Караџић)于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中期之间收集、整理、出版的塞尔维亚民间口传诗歌集引起了这批知识分子的强烈回应。^①

19世纪后半叶,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在塞尔维亚逐渐发展起来。但与此同时,来自西欧、中欧地区的新思潮、新观念也传入塞尔维亚知识分子之中,塞尔维亚文化环境愈发复杂。一方面,随着卡拉季奇的口传诗歌集在塞尔维亚的传播,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支持将传统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另一方面,随着1863年贝尔格莱德高等学校(Велика школа)的建立,塞尔维亚历史学状况发生了变化。贝尔格莱德高等学校是塞尔维亚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有一批在西欧大学受过教育的新一代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在此任教。这些塞尔维亚知识分子试图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应用于塞尔维亚历史的叙述。然而,由于他们没有接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只能按照实证主义哲学的原则解释塞尔维亚过去的一些已知事实。此外,随着兰克的《塞尔维亚及塞尔维亚革命历史》(A History of Servia, and the Servian Revolution)在塞尔维亚的译介,其对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如实直书”的史学观点也逐渐被部分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接受。^②其中,曾在维也纳接受过史学训练的伊拉里昂·鲁瓦拉茨^③就在兰克的影响下,在拉伊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对历史材料进行广泛和严格的考证,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鉴别材料真伪,以此确定历史书写的可信度,反对盲目地将民间口传诗歌作为历史书写的材料来源,因此被认为是塞尔维亚史学“批判主义学派”的代表。^④

1873年,鲁瓦拉茨发起了与浪漫派之间关于史学方法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大论战。论战的第一个焦点是鲁瓦拉茨和米洛耶维奇在“塞尔维亚人起源问题”上的争论。米洛什·米洛耶维奇以卡拉季奇出版的口传诗歌集^⑤为基础,于1872年提出“土著论”(Аутохтонистичка хипотеза):古塞尔维亚人是多瑙河—潘诺尼亚地区最古老的居民,且早在基督教传入此地之前,就已形成庞大的帝国。帝国幅员辽阔,影响力北至波罗的海、南至非洲大陆、西至意大利、东至印度甚至中国。他认为,所有斯拉夫人皆起源于塞尔维亚人,遂称克罗地亚人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称保加利亚人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人”、称俄罗斯人为“塞尔维亚—俄罗斯人”。^⑥1873年,鲁瓦拉茨对米洛耶维奇的作品进行分析,批判米洛耶维奇的资料不具有可信度,认为他是“骗子”,“编造民间诗歌,编造碑文和文字记录”,在幻想和自己的世界观指导下撰写历史。^⑦鲁瓦拉茨对米洛耶维奇的批评立即引起了米洛耶维奇的激烈反驳。他指责鲁瓦拉茨为“塞尔维亚民族的叛徒”,宣扬鲁瓦拉茨这种叛徒“应该

① Вук Стефановић Караџић, *Српске народне пјесме Књ. 1-5*, Штампарија Јерменског манастира, 1841-1865.

② Sima Ćirković, “Prelomno razdoblje srpske historiografije”, p. 280.

③ 黄艳红《记忆构建与民族主义:近代塞尔维亚历史中的科索沃传奇》,《世界历史》2019年第5期。

④ D. R. Woolf, *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 p. 825; Vatroslav Jagić, “Ilarion Ruvarac”, *Archiv für slavische Philologie*, Vol. 27, 1905, p. 635.

⑤ 卡拉季奇有意识地挑选“保存着古老的塞尔维亚历史和荣耀”的口传史诗,对其进行分割、剪裁和编排,以短歌集的形式出版。流传至今的史诗集不是对“未受污染”的天然诗歌的记录,而是对民族传统的再造和“发明”的产物。黄艳红《记忆构建与民族主义:近代塞尔维亚历史中的科索沃传奇》,《世界历史》2019年第5期。

⑥ Милош Милојевић, *Одломци историје Срба и српских - југославенских - земаља у Турској и Аустрији*, Св. 1, Никола Пашић, 1996, с. 15-19.

⑦ Иларион Руварац, “О раду Милоша С. Милојевића у Гласнику”, *Летопис Матице српске*, Књ. 115, 1873, с. 172-178; Никола Радојчић, *Зборник Илариона Руварца*, Београд: Српска краљевска академија, 1934, с. 60-67.

被处决”。^①

然而真正将此次大论战推向高潮的是鲁瓦拉茨与潘特利亚·潘塔·斯雷奇科维奇之间的交锋。1884年,斯雷奇科维奇主要以卡拉季奇的口传诗歌集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出版了《塞尔维亚民族史》(*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试图对中世纪早期的塞尔维亚历史进行概述。鲁瓦拉茨认为斯雷奇科维奇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语言能力不足、对史学方法无知。^②在研究基础能力上,鲁瓦拉茨认为斯雷奇科维奇拉丁语水平低下,“他对拉丁文的了解甚至还不如一个四年级体育生应该了解的多”,在中世纪资料翻译与解读过程中出现许多谬误,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能力,且片面地截取自己所需的词句,断章取义地进行写作;^③在资料来源上,鲁瓦拉茨指责斯雷奇科维奇不加批判地汇总了古罗斯文献中的材料。此外,鲁瓦拉茨还认为,斯雷奇科维奇是一位“爱国主义历史学家或历史赞美家”,其史学“方法”受到民族主义观念的指导,因此夸大了塞尔维亚中世纪国家的领土面积,不加辨别地把中世纪早期的塞尔维亚统治者颂扬为“最伟大的塞尔维亚爱国者”。^④

斯雷奇科维奇驳回了鲁瓦拉茨的批评,但没有拿出学术论据进行回应,而是简单地把鲁瓦拉茨归纳为“疯子、无知者”,认为鲁瓦拉茨“破坏了塞尔维亚的民族性,帮助了塞尔维亚人的敌人”。^⑤针对斯雷奇科维奇的反驳,鲁瓦拉茨对他的研究及研究方法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批评。鲁瓦拉茨提出,斯雷奇科维奇的观点在“塞尔维亚人起源问题”上与米洛耶维奇一致,也认为塞尔维亚人起源于热带非洲,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种之一,这只是对米洛耶维奇的“苍白模仿”。此外,鲁瓦拉茨重申了他的批评:斯雷奇科维奇滥用俄国学术著作,剽窃他人成果,其著作“史实不准确、逻辑与文字混乱”;斯雷奇科维奇是“骗子”,不懂历史批评,只会从“夸张的爱国主义角度解释过去,让情感和愿望战胜理智和理性”。鲁瓦拉茨还警告,斯雷奇科维奇的“泛塞尔维亚主义思想……从事宣传塞尔维亚统一的思想……试图将所有斯拉夫部落、部族和语言表述为塞尔维亚的”观念需要警惕。^⑥

鲁瓦拉茨得到了学界的大力支持。同时代克罗地亚的重要历史学家弗拉尼奥·拉弛基(Franjo Rački)、斯拉夫主义学者瓦特罗斯拉夫·亚吉奇(Vatroslav Jagić),都很欣赏鲁瓦拉茨的研究及其对塞尔维亚史学“批判主义学派”的贡献。^⑦鲁瓦拉茨于1888年被选入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皇家学院,同年被选入萨格勒布的南斯拉夫科学和艺术学院。此外,鲁瓦拉茨还受到了塞尔维亚年轻历史学家的支持和认同。塞尔维亚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斯托扬·诺瓦科维奇、历史学家柳博米尔·科瓦切维奇与鲁瓦拉茨对历史学科的理解相同,成为批判派的坚定追随者。他们坚持以理性的方式对待过

① Јован Радонић, “О Илариону Руварцу”, *Споменица Илариону Руварцу*, Филозофски факултет, 1955, с. 26; Michael Antolovic, “Modern Serbia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Nation-Building and Critical Scholarship: The Case of Illarion Ruvarac (1832 – 1905)”, pp. 332 – 356.

② Никола Радојчић, *Зборник Илариона Руварца*, с. 89 – 120.

③ 在关键的杜布罗夫尼克文书档案解读上,斯雷奇科维奇出现了不少谬误之处。参见 F. Miklosich, ed., *Monumenta Serbica spectantiam historiam Serbice Bosniae, Ragusii, Vienna*, 1858; Никола Радојчић, *Зборник Илариона Руварца*, с. 95。

④ Никола Радојчић, *Зборник Илариона Руварца*, с. 98 – 113.

⑤ Иларион Руварцац, “Прелаз с приказа на критику”, *Наше доба*, Београд: Штампарија Дра Младена Јојкића, 1885, с. 41; Никола Радојчић, *Зборник Илариона Руварца*, с. 126.

⑥ Никола Радојчић, *Зборник Илариона Руварца*, с. 127, 130, 138, 158, 200.

⑦ Michael Antolovic, “Modern Serbia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Nation-Building and Critical Scholarship: The Case of Illarion Ruvarac (1832 – 1905)”, p. 351.

去,认为历史书写要受方法论及历史研究规则的约束。^① 1893年,斯雷奇科维奇从贝尔格莱德高等学校退休,批判派代表之一的科瓦切维奇随即被推选为高等学校历史系教授;此后几年,批判派学者不断被推选为教授以替代退休的浪漫派教授,这标志着批判派的胜利,也标志着塞尔维亚史学向批判派的全面转向。^② 随着批判派的胜利,塞尔维亚皇家科学院(Српска краљевска академија)也正式建成,大力支持塞尔维亚中世纪史相关的史料发掘、考证与整理,并出版了重量级学术期刊《塞尔维亚皇家科学院之声》(Глас Српске краљевске академије),批判派的史学观念在贝尔格莱德高等学校影响力逐渐增强,塞尔维亚史学教育与研究开始专业化发展。

1894年,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的“大论战”彻底落下帷幕,后者最终胜利,确定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现代塞尔维亚历史学的雏形。但如果说浪漫派的出现以及产生影响力的时期是塞尔维亚史学史的大断裂时期,浪漫派和批判派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对历史采用“工具化”立场,就无视了两个学派之间的统一性与融合。实际上,浪漫派与批判派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的论述一脉相承。

二、浪漫派与批判派的一致性

实际上,塞尔维亚史学浪漫派与批判派之间并非只有论战。两个学派尽管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在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的论述内核上是统一的。自拉伊奇以来,塞尔维亚史学家格外注重对1459年之前塞尔维亚人历史的挖掘与研究,其中“塞尔维亚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③ 在这一问题上,几代塞尔维亚史学家沿着同一脉络逐渐发展自己的话语。因此,通过梳理几代塞尔维亚史学家在“塞尔维亚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问题上的话语脉络,人们能够看到批判派和浪漫派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论述内核的一致性。两派一方面均承认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拜占庭化”,确保了继承拜占庭帝国传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都对拜占庭帝国形象构建采取负面化的叙事策略,以凸显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的优越性。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最终烘托出“复兴塞尔维亚帝国”和“塞尔维亚族是帝国的核心民族”的重要理念。

① 更年轻一代的塞尔维亚史学家斯塔诺耶·斯塔诺耶维奇也对鲁瓦拉茨抱有欣赏和认同的态度。在斯塔诺耶维奇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中,他称赞鲁瓦拉茨是“一流的学者和最伟大的塞尔维亚历史学家”。参见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Иларијон Руварац”, *Стражилово*, Књ. 36, 1892, с. 574–575。

② Сима Ђирковић, “Јављање ‘Критичке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је’ на великој школи и универзитету”, с. 651–652。

③ 1459年,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彻底灭亡,塞尔维亚人正式开始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历史。因此,在18、19世纪塞尔维亚人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挖掘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前的历史成为塞尔维亚史学的必然。这一时期产生影响力的塞尔维亚史学作品几乎都以极大篇幅叙述了1459年以前塞尔维亚人的历史,而其中“塞尔维亚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重点,塞尔维亚的拜占庭历史研究也由此发展起来。参见 Јован Рајић, *Историја разних славенских народао напаче Болгар, Хорватов, и Србов*, Беч, 1795; Пантелија С. Срећко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Време краљевства и царства (1159–1367)*, 2Књ., Београд, 1884, 1888; 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 “Византијски чиновни и титуле у српским земљама XI–XIV века”, *Глас Српске Краљевске Академије*, Књ. 78, 1908, с. 178–279;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Византија и Срби*, 2Књ., Нови Сад, 1903, 1906;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Београд, 1910; Владимир Ђоро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Југославије*, Београд, 1933; Љубо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ћ, “Развој Византологије”, с. 656; Srđan Pivrtić, “A Case Study in the Emergence of Byzantine Studies: Serb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p. 482。

从浪漫派代表学者潘特利亚·斯雷奇科维奇于19世纪80年代第一次提出“拜占庭化”的观念,到包括斯雷奇科维奇的反对者、批判派的斯托扬·诺瓦科维奇和斯塔诺耶·斯塔诺耶维奇这些第二、三代历史学家,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四代历史学家弗拉迪米尔·裘洛维奇,“拜占庭化”的观念始终贯穿于塞尔维亚历史学家的论述中。^①

斯雷奇科维奇认为拜占庭对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的政治组织、社会和文化形式都带来了影响,且这种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完整且不可磨灭的”。^②诺瓦科维奇认为,塞尔维亚接受东正教、学习拜占庭文化礼仪无疑为塞尔维亚人的身份认同定下了关键特征。^③拜占庭对中世纪塞尔维亚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生活的影 响是一个“在政治和文化层面拜占庭化”的过程,特别是在中世纪塞尔维亚奈玛尼奇王朝统治期间(1217—1371年)。^④

斯塔诺耶·斯塔诺耶维奇认为塞尔维亚是拜占庭的文化亲属,被拜占庭赋予了“巨大的文明力量”:“任何了解我们过去的人,肯定熟悉拜占庭在政治和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们民族产生的巨大影响”。^⑤他还在《拜占庭与塞尔维亚人》第一卷的导言中提出:

塞尔维亚人的整个政治和文化生活……与拜占庭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并受到拜占庭的影响。可以说,在塞尔维亚历史的前十个世纪,拜占庭—塞尔维亚的关系是塞尔维亚历史的基础。也可以说,在塞尔维亚历史的前十个世纪,拜占庭—塞尔维亚的关系是塞尔维亚民族及其身份认同的基础。^⑥

塞尔维亚的拜占庭学研究先驱博日达尔·普罗基奇总结称“研究拜占庭历史是理解塞尔维亚民族历史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先决条件。”^⑦这一结论概括了在未来几十年主导塞尔维亚史学研究的范式,即塞尔维亚人实现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拜占庭化”。这不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史学观念,也是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广泛认同的观念。

然而,在塞尔维亚史学有关拜占庭的研究范式中,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历史学家承认“拜占庭化”将拜占庭文明描绘成一个成熟的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拜占庭是一个不断衰落的文明。关于这种两面性,可以从学术传统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来理解。

现代塞尔维亚史学的发展正好处在“拜占庭研究”制度化的时期。这就意味着塞尔维亚史学界同时接纳、吸收了有关拜占庭的学术传统和前沿成果。18世纪以来,西方学界有关拜占庭的研究基

① Пантелија С. Срећко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Време краљевства и царства (1159 – 1367)*, Књ. II, Београд, 1888, с. 524 – 525; 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 “О улози владоца у државном организму”, *Политичке студије*, Г. Кон., 1908, с. 303 – 313; Владимир Ђоро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Југославије*, Београд, 1933, с. 154.

② Пантелија С. Срећко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Време краљевства и царства (1159 – 1367)*, II, с. 109.

③ 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 “Словени балкански и њихова образованост”, *Зора*, Књ. 5, 1900, с. 153 – 156; 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 “Средњовековна Србија и римско право”, *Архив за правне и друштвене науке*, Књ. 1, 1906, с. 216.

④ 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 “Неколико тежа питања српске историје. Поводом књиге *Geschichte der Serben, von Konstantin Jireček, Gotha, 1911*”, *Годишњица Николе Ђурића*, Књ. 31 – 32, 1912 – 1913, с. 122; Радован Самарџић, *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 Из српске историје*, Нови Сад: Матица српска, 1966, с. 122; 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 “Византијски чиновни и титуле у српским земљама XI – XIV века”, с. 178 – 179.

⑤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Трци и Срби Васе Вујића”, *Дело*, Књ. 18, 1898, с. 482 – 483.

⑥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Византија и Срби I*, Нови Сад, 1903, с. ii – iii.

⑦ Божидар А. Прокић, “Византијске историјске студије у Француској”, *Дело*, Књ. 27, 1906, с. 56.

本以负面评价为主。^①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拜占庭研究”开始制度化、学科化,产生了一种新的、“无偏见”的认知模式。因此,塞尔维亚史学界也受德法“拜占庭研究”的影响,开始实践这种新的认知模式,拜占庭不再只有单一的负面形象。

此外,塞尔维亚历史学也受到俄国学界的深刻影响,这一点与塞尔维亚的现实需求息息相关。俄国学界将拜占庭描绘成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东正教精神的来源,罗马帝国传统和希腊古典文明的守护者。这种观念的核心是拜占庭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问题,这不仅在俄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第三罗马”^②话语中产生了共鸣,而且在“去奥斯曼化”的巴尔干地区、在争夺政治和文化优越性的巴尔干诸国中也产生了共鸣。特殊的学术传统和现实需求塑造了塞尔维亚史学有关拜占庭研究范式的两面性。

因此,在承认“拜占庭化”的同时,塞尔维亚史学研究中还充斥着对拜占庭帝国形象的负面描述。在这一点上,浪漫派与批判派也达成了共识。斯雷奇科维奇称拜占庭是一个“堕落的、没有思想的社会”,一个充满了“狡诈之人”的国家,其特点是“贫穷和道德败坏”“混乱和无政府状态”。^③拜占庭帝国的这种负面形象在塞尔维亚史学中被反复叙述。从19世纪80年代的斯雷奇科维奇到20世纪30年代的斯塔诺耶维奇,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裘洛维奇,拜占庭形象负面化也成了塞尔维亚史学研究特点之一。

斯雷奇科维奇认为,12—14世纪每况愈下的拜占庭,带着不断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征服和支配中世纪塞尔维亚人的野心,给塞尔维亚人套上一重“希腊枷锁”。他认为,拜占庭政治和文化传统给中世纪塞尔维亚带来了消极影响,影响了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斯拉夫核心”的形成,破坏了塞尔维亚人农庄自治的原始形式。^④

年轻一代的批判派历史学家也延续了这样的思路,^⑤并着重将衰败的拜占庭与兴起的塞尔维亚进行对比,强调塞尔维亚在拜占庭废墟上造就了新的帝国,此类话语直到20世纪40年代都活跃于塞尔维亚史学之中。^⑥裘洛维奇指出,塞尔维亚的深刻拜占庭化只在14世纪出现,而早期的塞尔维亚受到拜占庭的影响并不大。他还认为,塞尔维亚是“不断自我发展的国家,逐步成长为一个改进了

① 长期以来,拜占庭被西方等同于贫穷、颓废和专制的东方,可以参考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及爱德华·吉本等人对拜占庭的描述。参见 Voltaire, “Le Pyrrhonisme de l’histoire”,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Tome 27, Garnier Frères, 1876, p. 265; Montesquieu,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trans. Jehu Baker,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9, pp. 448, 460–461; J. B. Bullen, *Byzantium Rediscovered*, Phaidon Press, 2003, p. 7;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5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1—3页; G. W. F. Hegel, “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Fate”, in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trans. Eleanore R. Kron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pp. 182–301。

② 刘毅《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与民族意识的互构——俄罗斯思想与第三罗马自喻成因的关联性初探》,《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③ Пантелија С. Срећко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Време краљевства и царства (1159–1367)*, II, с. 36, 189, 358, 505。

④ Пантелија С. Срећко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Време краљевства и царства (1159–1367)*, II, с. 36–42, 811–816。

⑤ 诺瓦科维奇认为塞尔维亚需要克服拜占庭政治衰败的不利影响,挣脱其已经衰落的复杂僵化文化。斯塔诺耶维奇进一步将拜占庭形象负面化的论述发展成为“衰败、萎缩”的拜占庭与繁荣的塞尔维亚之间的比较,以凸显塞尔维亚的优越性。Стојан Новаковић, “Средњовековна Србија и римско право”, с. 221;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Од Велбужда до Косова*, Београд, 1931, с. 1。

⑥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Византија и Срби*, Књ 2, с. 13;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Прилике у Византији и на Балкану за време продирања и насељавања Словена”, *Српски књижевни гласник*, Књ. 17, 1906, с. 583–598;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с. 145–146; Јован Радонић, *Прошлост Старе Србије*, Београд: СКГ, 1912, с. 764–765; Владимир Ђоро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Југославије*, с. 162–163。

的帝国;而旧的拜占庭由于软弱无力,已经像腐烂的木材一样陷入废墟”强大的“塞尔维亚—拜占庭帝国”注定要取代“枯竭而衰败的”拜占庭。^①

此外,塞尔维亚史学中“复兴塞尔维亚帝国”的叙事同样起始于斯雷奇科维奇在《塞尔维亚民族史》中的论述,也同样被批判派接受并沿用。

根据斯雷奇科维奇的论述,塞尔维亚中世纪的统治者斯特凡·杜尚(Стефан Душан),决心摧毁拜占庭、维护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性地位,建立了“塞尔维亚—拜占庭帝国”,以此彻底取代拜占庭衰败的政治和文化机构。斯雷奇科维奇把斯特凡·杜尚称作“新君士坦丁”,同时,在写到中世纪塞尔维亚历史给今人的教训时,主张“恢复我们的帝国”“恢复斯特凡·杜尚的帝国”。^②

而批判派的诺瓦科维奇认为,塞尔维亚帝国是拜占庭帝國的斯拉夫形式,“塞尔维亚人是拜占庭帝国领域内唯一的南斯拉夫部落……给邻近的部落带来了自由和成为民族国家的机会”,强调塞族的优越性、塞尔维亚帝国在巴尔干的积极意义,暗示复兴塞尔维亚帝国的必要性。斯塔诺耶维奇则指出,复兴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国家是民族统一和解放的重要措施,恢复对民族黄金时代的信仰成为“塞尔维亚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的象征”和“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盟约”。^③这种“复兴帝国”的话语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构建带来了巨大影响,为塞尔维亚加入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重要的民族动员,提供了详实的学术支撑。^④

在发展“复兴帝国”观念的同时,“塞族是帝国核心民族”的观念也在酝酿。斯雷奇科维奇在《塞尔维亚民族史》第二卷中提出:塞尔维亚公国,这个中世纪“单一民族国家”,在“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皇帝”^⑤杜尚时期发展至顶峰,超越了“民族”的限制,成为“多民族”的塞尔维亚帝国。^⑥而斯塔诺耶维奇在其著作《塞尔维亚民族史》中提出:杜尚帝国“由非常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构成”,其中“塞尔维亚元素……是这一多民族帝国的中流砥柱”,强调了塞尔维亚人作为历史上国家建设者和帝国核心民族的地位。他认为,塞尔维亚人拥有一种构成了中世纪早期以来整个塞尔维亚历史的国家构建能力,这种能力辐射到了所有巴尔干民族,也对其他斯拉夫和非斯拉夫民族产生了广泛影响。^⑦斯塔诺耶维奇的这一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学家。南斯拉夫王国史学家裘洛维奇认为塞族是帝国的核心民族和主要族群,这个民族注定要成为现代的领导者;塞尔维亚的“国家构建元素”是整个中世纪帝国政治生活的支柱,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⑧

这种“复兴帝国”且“塞族是帝国核心民族”的观点也渗透到20世纪早期的通识教育中。米连科·武基切维奇(Миленко Вукићевић)在其两卷本民族史教材中指出:塞尔维亚中世纪的统治者们

① 弗拉迪米尔·Горовић,《Историја Југославије》,с. 152.

② Пантелија С. Срећковић,《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Време краљевства и царства(1159–1367)》,Д, с. 344, 716, 817.

③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с. 209;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Цар Душан》,Београд,1922,с. 3–5.

④ Васа Чубриловић,“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Српски књижевни гласник》,Књ. 51,1937,с. 597.

⑤ Љубомир Стојановић,《Стари српски родослови и летописи》,Сремски Карловци,1927,с. 103.

⑥ Пантелија С. Срећковић,《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Време краљевства и царства(1159–1367)》,Д, с. 559–560.

⑦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с. 13,142.

⑧ 弗拉迪米尔·Горовић,《Историја Југославије》,с. 153.

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将取代衰弱的拜占庭帝国,并容纳巴尔干地区其他国家与民族。^①在斯塔诺耶维奇编纂的中学历史教材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论点。以上观点不仅在专业历史学家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对更广泛的塞族民众的历史想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

通过上述梳理,人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浪漫派和批判派史学家在对“塞尔维亚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问题上的话语脉络,都经历了一个从承认中古塞尔维亚国家“拜占庭化”,同时又着重对拜占庭帝国的“负面化描述”,以烘托“复兴塞尔维亚帝国”并强调塞尔维亚人是“中世纪多民族帝国的核心民族论”的过程,两派在这一时期的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产生了融合。而这种一致性与融合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学派在阐释关键历史问题时有着统一的逻辑。

三、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统一逻辑

根据前文所述,浪漫派和批判派在史学方法上的确存在分歧。浪漫派倾向于不加批判地将塞尔维亚传统史诗、古罗斯文献作为史料,而批判派则认为应当对历史材料进行考证和甄别,以可信的史料为基础进行史学写作。但除去史学方法上的分歧,两个学派在阐释关键历史问题时背后的逻辑是统一的。他们都以塞尔维亚民族当下的政治诉求、国家构建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

首先,在“早期塞尔维亚人起源问题”上,两派背后的逻辑是统一的。尽管在这一具体历史问题上两派的观点表面大相径庭,但仔细观察其背后逻辑,能够发现无论浪漫派还是批判派,都以塞尔维亚民族当下的政治诉求为自己的出发点,做出了他们认为符合塞尔维亚民族现实利益的解释。塞尔维亚民族此时的首要政治诉求在于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政治与知识界精英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去奥斯曼化”。

这一时期,正值奥斯曼帝国式微,“东方危机”显现之时。两派在这一具体历史问题上的历史书写,都以塞尔维亚民族当时的政治诉求为出发点,试图通过挖掘、整理民族记忆来构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做出了他们认为符合塞尔维亚民族利益的解释。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构建的方法是发明传统、伪造历史、制造历史神话、对历史进行重新构建,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民族历史都依赖于“传统的发明”。^③“源远流长”被视为想象的最重要属性,它使占有领土合法化。^④一方面,浪漫派捏造史料,鼓吹塞尔维亚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族群之一、是巴尔干地区土生土长的族群,发明了这种强调“古老性”的传统,人为地创造出当下塞尔维亚人与过去的连续性,试图通过重复灌输这种观念,暗示塞尔维亚民族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批判派将早期塞尔维亚人起源问题归入“拜占庭化”的话语框架下,认为早期塞尔维亚人在伊拉克略(Heraclius)统治时期跨过多瑙河定居巴尔干半岛,是“在政治和文化层面拜占庭化”的起始

① Миленко Вукиће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Од доласка Срба на Балканско полуострво до половине XV столећа*, Доситеј Обрадовић, 1904, с. 163.

② Станоје Станојевић,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ог народа за средње и стручне школе*, Београд, 1919, с. 35-83.

③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④ Ivaýlo Dichev, “The Eros of Identity”, in Dušan Bjelić and Obrad Savić, eds., *Balkan as Metaphor: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MIT Press, 2005, pp. 237-238.

点,由此奠基了塞尔维亚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构建的基础。两者实际上是塞尔维亚史学家“去奥斯曼化”进程的一体两面。不论强调“塞尔维亚人士著论”的“古老性”,还是强调迁移而来的塞尔维亚人的拜占庭化,都是为了把握奥斯曼帝国统治力量减弱这一时机,弱化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近五个世纪的影响,强化塞尔维亚人作为“基督教欧洲族群”的身份认同,为争取民族独立赋予合法性与正当性。此外,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巴尔干各民族处在激烈的身份认同构建竞争之中。在现代化迟滞的条件下,身份认同的构建意味着对微小差异进行激烈竞争、对自身“所谓特性”进行过度投注、忽视与竞争民族的同一性。^①希腊民族运动首先发起了巴尔干地区寻找民族“古老性”的竞赛,^②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纷纷加入发明“古老性”、强调民族“欧洲血统”的竞争中。^③塞尔维亚史学也开始了这种构建,用“塞尔维亚人士著论”强调“古老性”,用塞尔维亚人“拜占庭化”强调本民族的“欧洲血统”,不仅在历史书写、历史记忆的层面“去奥斯曼化”,还力图凸显塞尔维亚人在这一地区的优越性。^④

其次,浪漫派和批判派一致认同并实践“拜占庭形象负面化描述”叙事策略,强调塞族的优越性、塞尔维亚帝国在巴尔干的积极意义,暗示复兴塞尔维亚帝国的必要性,实际上这与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期间塞尔维亚王国提出领土诉求、向外扩张、增强在巴尔干半岛影响力的政治意图不谋而合。对刚获得独立的塞尔维亚来说,“去奥斯曼化”的历史任务已经初步完成,这一阶段的战略优先是向南扩张,^⑤因此,他们的叙事策略发生了转向。这种转向以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为基础。1844年,时任塞尔维亚王国外交部部长的伊利亚·加拉沙宁(Илија Гарашанин)提出《草案》(Начертаније),倡议建立“伟大的、新的塞尔维亚国家”,“重建13、14世纪丰美而光辉历史中的塞尔维亚帝国”,将所有大量塞族人口聚居的地区容纳进来,奉行“塞尔维亚主义”(Serbism)。^⑥《草案》及其背后的“塞尔维亚主义”理念引起了塞尔维亚知识界和政界的重视和广泛讨论,推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力量的进一步扩大,影响深远。作为批判派代表学者之一的诺瓦科维奇也受到了这种理念的影响。他曾任塞尔维亚王国教育部部长,后来一度在时任总理伊利亚·加拉沙宁之子米卢廷·加拉沙宁(Милутин Гарашанин)的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之后又两度成为塞尔维亚王国首相,对塞尔维亚王国向外扩张的外交部署起到了决定性作用。^⑦着重对拜占庭帝国的“负面化描述”以烘托“复兴塞尔维亚帝国”的历史叙事,符合这一时期塞尔维亚王国向外扩张、争夺巴尔干地

① Michael Ignatieff,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Penguin, 2006, pp. 40–41.

② Ivaylo Dichev, “The Eros of Identity”, pp. 237–238; 庞国庆《希腊民族书写视域下的拜占庭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

③ Paisii Hilendarski, *Slav-Bulgarian History*, Bulgarski Pisatel, 1972, p. 12; Nicolae Iorga, *Etudes Roumaines: Influences étrangères sur la nation roumaine. LeVons faites à la Sorbonne*, Librairie universitaire J Gamber, 1923, p. 23.

④ 有塞尔维亚批判派史学家认为,“塞尔维亚人早已把自己的斯拉夫亲属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参见 Никола Радочић, “Ратничке врлине Срба у средњем веку”, *Глас Српске Матице*, Књ. 353, 1940, с. 325.

⑤ Ranka Gašić, “Struggling with Yugoslavism in the First Yugoslavia: The Belgrade Elite and the Public Debate”, *East Central Europe*, Vol. 42, No. 1, 2015, p. 31.

⑥ Радош Љушић, *Књига о Начертанију; национални и државни програм Кнежевине Србије (1844)*, БИГЗ, 1993, с. 158; Pija Garašanin, “The Draft”, trans. Vedran Dronjić, in Balázs Trencsényi and Michal Kopeček, eds., *Discours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 Europe (1770–1945): Texts and Commentaries*, Vol. 2,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8–243; Dennison Rusinow, “The Yugoslav Idea before Yugoslavia”, in Dejan Djokić ed., *Yugoslavism: Histories of a Failed Idea 1918–1992*, C. Hurst & Co., 2003, p. 17.

⑦ *Дипломатски архив – Дубровник*, ПП оделъ, Ф. 1; Jasna Dragović-Soso, “Rethinking Yugoslavia: Serb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13, Issue 2, 2004, p. 172.

区更大话语权的政治诉求。

再次,强调塞尔维亚人是“中世纪多民族帝国的核心民族”,也反映了塞尔维亚两派知识分子追求民族政治利益的本质。

这一时期,“南斯拉夫主义”(Yugoslavism)思想在南部斯拉夫族群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19世纪中期,克罗地亚知识分子斯特罗斯梅耶(Josip Juraj Strossmayer)和拉弛基提出“南斯拉夫主义”,认为南斯拉夫人可以围绕共同的起源、共同的语言联合起来,倡议通过文化和政治合作实现南部斯拉夫人的一体化。19世纪60年代,在塞尔维亚国王米哈伊洛·奥布莱诺维奇(Михаило Обреновић)的支持下,加拉沙宁曾与斯特罗斯梅耶有过接触,商讨塞克合作、共同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但随着米哈伊洛政治计划的流产及其本人被刺身亡,塞克合作的尝试在两年后告终。直至20世纪初,塞尔维亚王国仍无视南斯拉夫主义理念,只把它视作大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一种伪装,认为它是罗马天主教历史上对分裂的东正教世界“东进”(Drang nach Osten)的一种新形式。^①

不过,这一时期实际的政治状况也在逐渐推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精英们走向合作,这使他们改变了对“南斯拉夫主义思想”的态度。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与奥匈帝国的对抗中认为,他们需要塞尔维亚人及巴尔干腹地的支持,以确保他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政治诉求得到更多保障。因此,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部分塞尔维亚人开始主张奥匈帝国南部斯拉夫民族的社会一体化。另一方面,塞族人在地理上也很分散,他们的统一必须依靠与其他南斯拉夫人联合。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践行南斯拉夫主义,塞族和克族才能确保他们的民族领土:伏伊伏丁那的塞族领土、达尔马提亚的克族领土,以及他们各自在波黑的领土。^②1918年10月,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国家在奥匈帝国南部建立,12月与塞尔维亚王国统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诞生。^③

南斯拉夫主义成为一战后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但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及知识分子以为本民族争取最大化的领土利益为目标,挪用、改写甚至扭曲了南斯拉夫主义的某些内涵,^④推行南斯拉夫主义的背后是被遮蔽的“塞族是南斯拉夫核心民族”的观念。因此,在践行南斯拉夫理念这一趋势之下,塞尔维亚史学界迅速做出反应,开始侧重浪漫派代表斯雷奇科维奇强调的“多民族帝国的塞尔维亚特性”以及批判派代表斯塔诺耶维奇所述的“塞尔维亚元素是多民族的特凡·杜尚帝国的中流砥柱”,以迎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政治现实,为塞尔维亚民族成为这一新建立的多民族国家的“核心民族”提供学术支撑和历史依据。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不难发现浪漫派与批判派在“早期塞尔维亚人起源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个学派一致的话语脉络,实际上都是以塞尔维亚民族现实利益优先为考量、以实际的国际与政治环境为转移而做出的选择。尽管批判派代表鲁瓦拉茨一再驳斥浪漫派以爱国主义热情指导历史书写,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浪漫派还是批判派,都以民族主义为指导书写塞尔维亚历史,试图通过挖掘、整理民族记忆来构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民族政治目的创造合理

① Dennison Rusinow, “The Yugoslav Peoples”, in Peter F. Sugar ed., *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1995, p. 357.

② Dimitrije Djordjevic, “Yugoslavism: Some Aspects and Comment”, *Southeastern Europe*, Vol. 1, No. 1, 1974, p. 193.

③ 参见白伊维《关于前南地区国家转型问题的三个概念辨析》,《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

④ Dennison Rusinow, “The Yugoslav Idea before Yugoslavia”, p. 19.

性与合法性。对民族现实利益的考量成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突出特点,由此也确立了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

结 论

综上所述,在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二十余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两者在重点问题和关键叙述的论述上是统一的。自拉伊奇以来,塞尔维亚史学家格外注重对1459年之前塞尔维亚人历史的挖掘与研究,其中“塞尔维亚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通过梳理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脉络,我们能够看到批判派和浪漫派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论述内核的一致性。两派都以民族主义为指导书写塞尔维亚历史,为实现民族政治目的创造合理性与合法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史学方法,又在两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因此,认为“在塞尔维亚史学之中,只有浪漫派美化、工具化历史,以民族主义思想指导历史书写,浪漫派的出现是塞尔维亚史学史上的一个‘大断裂’,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在经历两个学派之间的大论战后彻底摒弃了浪漫派的史学方法和意识,开始了真正的发展和构建”的观点有失偏颇。而且,受到民族主义指导的历史书写依然存在于塞尔维亚史学之中,以塞尔维亚民族利益为优先考量在历史书写中剪裁有用的历史片段、为民族利益提供学术支撑和历史依据,都影响到塞尔维亚史学的客观性。此外,现代塞尔维亚史学的民族主义性质并非巴尔干地区的特例。充分认识到现代塞尔维亚史学的这一特点及现状,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分析塞尔维亚史学界的观点,更全面地理解塞尔维亚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历史。

(作者洪羽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300350)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d twice offered concrete directives requesting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 the guiding ideology in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Comm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ith a constitutional nature stipulated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hould be the only scientific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view in all walks of this country's political life. Since th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story discipline, including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has been carried o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 and the Soviet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the West, China's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faced some problems after the mid-to-late 1980s, such as the confusion of historical view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vague position and unclear standpoin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rapid Westernization of thinking.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uphol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Marxism, especially the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doing so, we can place ourselves on the fron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draw 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past, to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Rural Historiography // Gao Liao

Modern Japanese rural history took its roots in the rethinking of modern Japan and wa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wentieth-century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 rise of the field.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Kouza-school and the Rono-school appli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ing the nature a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Japanese rural society in the Debate on Japanese Capitalism. After the 1960s,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Japan, rural history researchers not only continu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existing fields but also explored various new themes such as peasant movements and autonomous village communities. The research paradigms were subsequently revised.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search on rural history declined right after its flourishing, gradually fell into a state of fragmentation, and became marginalized. At the same time, several new trends started unfolding, such as an emphasis of market factors. Rural society is not only an unavoidable and important subject in Japan's modern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a key entry point of Marxist studies of Japanese-style capitalist society.

Rethinking Neo-Colonialism // Bi Jiankang

Neo-colonialism has long been a heated debate issue among scholars. While scholars in the West have been criticizing neo-colonialism through various approaches, scholars in China are also debating this concept. After the World War Two, neo-colonialism evolved from old colonialism, and shaped new colonial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is is what Kwame Nkrumah conceptualized, the realistic basis of classical neo-colonialism. In the 1970s and 1980s, especial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o-colonialism had undergone some major changes. This "developmental neo-colonialism" is what colonialism has become of under the neo-liberalism during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eriod. Ample evidence and historical logic have fully proved that Chin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eo-colonialism.

The Collision and Fusion of the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tical School: The Rise of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1873 - 1940) // Hong Yuqing

After Serbia gain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a vital debate on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s, concepts, and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broke out between the Romantic School and the Critical School. The former supporte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folk epics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latter supported the examination and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debate lasted for almost 20 years and ended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Critical School. This gave birth to the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bia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lthough the two schools differed in their approaches, they were in fact consistent in their focus and key narratives of Serbian historiography. It was through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that Serbian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embraced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through the fusion of the two schools that it inherite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guid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thus establishing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bian historiography.